

小人书里的旧时光

◆ 熊仕喜

我经常对学生说,要多读一些课外书,这对提高自己的语言素养很有好处。我就是吃了小时候没读多少课外书的苦,写不出像样的文章。说到这,总会有调皮的孩子反问一句:“老师,你小时候也不爱读课外书吗?”

其实,他们哪里知道,不是我不爱读书,而是那时的我实在找不到课外书来读啊!

说起来,已经是三四十年的事了。那时我们书包里除了语文、数学两本教材之外,也就只剩几支铅笔、几本皱巴巴的写字本了。如果说书包里还能找到别的,那肯定就是用泥丸烧成的弹珠和用废纸折成的正方形的“方炮”了。在农村,打弹珠、砸“方炮”、滚铁环似乎成了我们课余生活的全部。

最初接触到课外书的时候,我好像

读五年级了,那时的课外书就是连环画,我们称它叫“小人书”。当年邻村的一个同学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本《枪挑小梁王》,我们争先恐后地借看着。栩栩如生的图画加上简洁明了的文字,我们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。岳飞的武艺高超,小梁王的骄横跋扈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。那之后,我便迷上了小人书。可惜,当年在我们乡村,很难买到小人书。偶尔有家庭条件好一点的同学买来一本小人书,同学们排着队地跟他借。记得有一次,为了向一位同学借小人书

《三打白骨精》,我偷偷地从家里拿来几把自家都会不得吃的山芋角与他交换。他津津有味地吃着山芋角,我津津有味地看着小人书,各得其乐。

上初中的时候,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改观。那时,瓦垱街上有人摆摊出租小人书,一天看一本只要几分钱,我们就成了书摊的常客。看得多了,有时情不自禁地在课本上空白处画着小书里的人物形象。初二的一节英语课上,我照着小人书上的样子,在课本上画霍元甲与俄国大力士打擂的场面。由于画

得太投入了,老师过来把我放在膝盖上的小人书一把抢走,我才回过神来。老师说学英语学得不好,但这画嘛还是画得有点模样,也不知道他是夸我还是讽刺我,但我清楚地记得那本小人书被老师当场给撕掉了。唉,为了赔那一本借来的小人书,我可是省了好几餐的早点钱!

一本本小人书,为我打开了一扇扇窗,领略了许多课本上见识不到的精彩,也让我有了进一步探寻课外书精彩世界的念头。上师范后,图书室成了我的最爱,读的书也越来越厚实,读书成了我的最大乐趣,但我知道,这乐趣的源头还是那一本本薄薄的小人书啊!

如今,小人书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,但小人书里的旧时光却在我记忆中闪烁,如点点流萤,装饰着夏夜的梦。

桂姨是母亲的干妹妹。

咱们两家是紧邻邻居,仅隔一板壁,说话都不要过门。我母亲长得高大粗壮,嗓门大,脾气暴,好打抱不平。桂姨生得羸弱,有着江南女子的秀丽,说话柔声柔气的,对人很和善。

两人的外貌和性格反差很大,但没妨碍她们俩成为一对最要好的姐妹。

母亲身体好,善养生,那时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,我的兄弟姐妹接二连三地来到这个世上。桂姨结婚多年,一直没有孩子,特别喜欢我们兄弟姐妹。

桂姨家没有孩子却有老人,老人叫发爹。不是桂姨的亲爹,是桂姨父亲开茶馆时的伙计。发爹无儿无女,只有一个承嗣的侄子。桂姨爹去世后,茶馆停了业,桂姨把发爹留在家中,一起过日子,桂姨对发爹很孝敬,衣食住行照顾得很周到,像亲爹一样服侍。

一家人日子过得很和睦。发爹一天比一天老,腰弓了,眼也花了。桂姨时常就着她家那盏玻璃罩灯,在暗淡昏黄的灯光下给发爹修剪指甲。满身的老人味,满脚的臭气,她全然不觉,低着头,柔柔的手轻轻地剪着,修着。每天端茶倒水,给发爹洗脸洗脚,一年四季为发爹添衣,缝补浆洗。

发爹病倒在一个漆黑的夜里,住进了医院,胆结石,要开刀。八十三岁的老人,桂姨不好作主,终究不是自己的亲爹,桂姨请来了发爹的侄子。开刀后,发爹情况不好,弥留之际,桂姨对发爹说:有什么事要交代,还有什么东西,要对你侄子说清楚,交给他。

发爹满眼泪珠地瞅着桂姨不吱声,只是摇头,紧紧拉着桂姨的手。

“发爹,你说,你说清楚了。”桂姨轻声地说。

“那有四百六十元钱放在衣箱里……”话音一落,发爹就离开了人世。

发爹离世的那年是1977年。那晚,他侄媳急急忙忙地赶来,打开衣箱,四百六十元,一沓子整整齐齐地摆在那儿,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。他侄媳心安理得地揣进兜里,走了,客套话也没撂一句。

母亲为桂姨愤愤不平,“这娘儿怎么这样不讲究,干妹子你服侍了发爹这多年,这些钱还不是你平日给发爹的。这娘儿生前不来倒口茶,端杯水,送上一菜一汤的,人才死倒会来要钱。干妹子你也太好说话了。我就咽不下这口气,走,我给你出这口气去。”

母亲气愤不已,桂姨却心平气和,说:“姐,别这样,这样我安心,要不我就不催发爹说,我把发爹当亲爹,用些钱,服侍他,我情愿。”

母亲见桂姨这么说,也就不算了,只是心里为干妹子不服气。发爹去世后,桂姨很伤心,心里闷,就往母亲这边跑,帮我母亲做做事,和我母亲唠唠话说说家常。两姐妹虽然脾气不一样,却相处得很好,你帮我我帮你,胜过亲姐妹,好像她们之间有一条血线的纽带缠在一起。

其实这胜似血线的缘带不是别人,而是我。谁叫我母亲把我送给桂姨做了养子呢。

至今我还记得母亲的这句话:桂姨她人好,心好,把你给她,娘舍得,愿意。

桂姨

◆ 刘志平

咏环卫工人

◆ 唐正国

煮微灯火扫残星,长帚频挥巷陌新。
暑酷寒严无报笔,橙光升处暖人心。

访源溪村

◆ 操礼旺

白洋河起縠溪曹,静谧清幽远世嚣。
三柱尖峰云际耸,千年银杏向天骄。
绵绵峡谷蕴佳景,袅袅雄音漫九霄。
科第流芳承古韵,风华绝代看今朝。

升金湖即景

◆ 李远乡

闲湖百里晚霞倾,散见游凫结对行。
忽有金麟翻浪出,惊飞水鸟两三声。

老家堂屋那张老方桌,我记了四十多年。那桌子是父亲当年从后山伐了两棵老柞木,亲手打制出来的。桌是赣东北常见的普通八仙桌,桌面平整,呈现出木质原生的纹理,四条腿却因家里的泥巴地,永远摆不平。吃饭的时候,常有一条腿悬着空,得找块石子或者碎瓦片垫进去,晃一晃,再压一压,勉强能稳住,但用餐时稍微身子靠一靠,桌子还是会摇晃,碗里的汤粥会洒出来。父亲试过很多办法,换过不同大小的石子,把地刨平,甚至修过桌腿,可过不了一个月,屋里潮气一泡,地面又软塌下去,桌子有时依旧歪着。母亲望着方桌,眉头紧锁,只是每次端菜上来更小心了。那时候我还小,不理解其中的尴尬与别扭,反而觉得摇来晃去很好玩。

父母亲那辈人,穷是刻进骨子里的。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,全靠生产队的工分分钱,我家八张嘴(后来变成七张),全靠父亲一个人以木匠手艺换工分维持。工分永远不够,粮食永远不够吃。家里的泥巴地面,坑坑洼洼的,即使大晴天,走起来鞋底上总是粘了一层又一层厚厚的湿泥,像是咬人不放的蚂蟥,甩也甩不去。仿佛《长征》电影里红军穿着草鞋过沼泽地,我们兄弟姐妹总是有人滑倒,何况是那张方桌?不平稳,日子也就那么过了。为了节省点,母亲常常用南瓜或红薯夹在米饭里煮给我们吃,以至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,一听说要吃南瓜饭和红薯饭,我的胃总会条件反射地翻出酸水来。父亲每天天不亮就会挑着一副木工担上户,天黑透了才回来,手指上刀斧划过的痕迹叠叠累累。可就算这样,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,还是得去隔壁邻居家借粮。而那时候父亲做的最艰难的抉择,就是让大哥放下读书念头安心当农民。

当时,除了啾啾学语的弟弟妹妹,我五岁,三哥七岁,二哥九岁,大哥十一岁。我不知道,面对一连串出生的我们,父母是怎样的欣慰与揪心。是要读书的年龄了,看着别人家的娃背着书包去上学,父亲坐在那张垫不平的方桌上,整夜整夜地抽着旱烟。有一天,大哥拎起一个布袋吵着要去读书,父亲竟大声对大哥吼起来:“读什么读,你老大,留在队里挣工分!”记得那天大哥把布袋摔在方桌上,桌子晃得厉害,碗掉在地上摔碎了,一块碎瓷片扎进了大哥的脚脖子,流出的血把地上的泥巴染成了暗红色。大哥如突然瘪下去的气球,蹲在地上呜呜大哭。父亲别过去脸不去看他。母亲坐在灶台边抹眼泪,一句话都没说。可哭后又怎么办呢?从那天起,大哥就扛起了比他还高的锄头,每天跟着村里人下地,手上的茧子跟地人一样厚。原本白净的脸,不到一年就晒得黑黢黢的,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庄稼汉。

家如浪里的竹筏,摇摇晃晃。六个儿女里,二哥十岁的时候得了痲病,面

色蜡黄,整日整夜咳个不停,那钝钝的咳嗽就像是闷雷,声声撞得家里每一个人的心惶惶地生疼。农村缺医少药,唯有的一个赤脚医生也是束手无策。家里凑不出钱去城里看病,拖了大半年,人就没了。小小的尸身就放在没有墙壁的厢房的一个簸箕上,母亲趴在桌上,肩膀一抽一抽地无声哽咽。桌子还是晃,似在颤抖,好像此刻它也体会到了家人无边的悲痛和凄凉。

除了大哥,剩下我们四个,父亲咬着牙,硬是一个一个都送进了学校,小学,初中,高中。那时候村里小学毕业接着读书的人少,我们一家就四个,旁人既不可理解,又都羡慕父亲有本事。可只有我们自己知道,每一分学费都是父亲从嘴里一口一口省出来的,是大哥在地里一寸一寸刨出来的。我上师范那年,要出远门求学,需三十元钱作为半年的生活费,家里没有,大哥拿出自己卖木头攒了三年准备买手表的钱,放在那张垫不平的方桌上。手压着桌面,桌子晃了晃,他说:“弟,在外好好念书,别

托了人去打听,姑娘家人总是支支吾吾的,不是嫌村庄偏僻,就是嫌大哥没文化。媒人跑了一波又一波,最后姑娘本人答应了,或许看中了大哥的手艺,或许看中了大哥的忠厚勤勉。农村那时候娶媳妇着争彩礼,对方要四百块钱,还要一辆自行车。那时候四百块钱可不是小数,父亲把多年攒的全部积蓄都拿出来,还是不够。结婚那天,姑娘始终不肯坐上接亲的自行车。看着越来越黑的夜色,越来越凉的宴席,父亲急得几乎是捶胸顿足,眼泪是吧嗒吧嗒掉。最后邻里亲戚相借,才凑够了钱,把嫂子娶进了门。记得嫂子到家,已是深夜十二点了。事后有人问起,你们家那么多儿子,以后怎么成家呢?母亲叹了口气说:“想不了那么多了,欠老大的,这辈子总得补上一点,不然眼睛都闭不上。”

为了给大哥结婚,家里掏空了,看着我们剩下的兄弟一个个如到了季节的瓜儿长大成熟,父母亲不知愁白了多少头发。等到三哥要结婚的时候,家里就再拿不出像样的彩礼。三嫂进门那

垫不平的老方桌

◆ 陈志发

像哥一样,一辈子困在这泥巴地里。”我那时候看着黧黑的大哥,想说谢谢,可话到嘴边,什么都没说出来,只有一个劲地点头。

日子慢慢过,矛盾就像桌子底下的石子,永远存在,隔三差五就硌得人难受。大哥只要跟父亲吵架,必然会拿没读书这件事儿怼过去。有一年开学季,大哥突然扔掉手中的锄头,大喊着要去读书。正是生产队里出工的时间,邻居又拖又拽都拉不动大哥去出工。在一旁的父亲憋红着脸,忍不住过去刮了大哥一个耳光。大哥竟歇斯底里起来,嚷着不如去跳河算了。父亲情急,把大哥用绳子绑在木柱上,不断地拿竹枝去抽打。大哥失去理智,他红着眼睛咆哮:“你们就是偏心,我不是你们亲生吧?为什么不让我读书?为什么偏偏是我?你们就是觉得我是老大,就该牺牲,对吧?”父亲手一直在抖,嘴嘟囔着,半天说不出一句话。母亲看着满身血痕的大哥捂着嘴哭,满屋子都是哭声,空气仿佛凝结。我那时候已经懂点事儿,站起来想劝大哥,可被三哥一把拉住了。他冲我摇了摇头。我知道,这是我们家的死结,谁也解不开。父母不是不委屈,他们也无奈。牺牲的刀子扎在大哥心上,也扎在父母心上,谁都拔不出来。

分产到户后,家里稍微可以喘口气时,大哥开始跟着父亲学木工。有次在上户做工时,大哥看中了东家为他锯木料时坐马扎的姑娘。父母很是高兴,忙

天,脸拉得很长,跟母亲吵了一架,说父母偏心老大,把钱都花完了,轮到她就没有了。后来我师范毕业参加了工作,假期回去,跟母亲坐在院子里,母亲跟我说:“孩呀,你得好好工作。你娶媳妇,我和你爸帮不上忙了。千万别怨我们。我们亏欠了你大哥,也亏欠了你二哥、三哥,看来还要亏欠你和你的弟妹。”愁苦堆积在母亲脸上,可以拧出水来。

我怎么会不理解父母此刻拧巴的内心呢?那张垫不平的方桌,因为泥巴地坑洼,就像穷得叮当响的父母心里的那杆秤,天生就难摆平。父母不是不想公平,每个孩子都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,哪一个不疼?可当年的穷,是横在面前的大山,你不搬来一块石头垫脚,就全都会摔下去,总得有人牺牲做那一块石头。父母一辈子都在愧疚,一辈子都在想弥补,可补来补去,不公平就难免了,心里有了疙瘩。父母能怎么办?他们就是土里刨食的农民,没有大本事,他们能做的,就是拼尽全力把每个孩子都拉扯大,能读书的尽量读书,能成家的尽量成家,可就算拼尽了全身力气,还是留了一堆亏欠,一堆疙瘩,永远解不开。

后来我们几个都长大了,都安了家,有了自己的日子。我住在一个小城镇上,寡居的母亲却仍守着他们的那间老屋。每次回去看望母亲聊起家常,她总是感叹不已。堂屋的地面早已换成了水

泥地,平平整整的,可那张老方桌,还是摆在那里。我跟母亲说,换张新桌子吧,现在日子好了,也不差这几个钱。母亲摇了摇头,摩挲着桌面说:“不换,这桌子我和你父亲用了一辈子,习惯了。”我蹲下来,像当年父亲那样,晃了晃桌子,终于平了。可坐下来吃饭的时候,我还是觉得哪里不对,总觉得桌子还在晃,就像这么多年,我们心里那点疙瘩。

我又想起了父亲。父亲是突然走的,走的时候,才五十四岁。他是累倒的。那天刚收完秋季的最后一茬晚稻,妹妹的婚事刚刚敲定,傍晚,面对母亲端上方桌的一圈菜,父亲捶了捶酸痛的腰对母亲说,来点酒庆祝一下吧。可就是这一小杯酒,让患了高血压而不肯去医治的父亲躺上床后就再也没有起来,一句遗言也没有留下。母亲跟我们说:“你们的父亲生前总说,这辈子最对不起老大,也对不起你们几个,没能给你们平等的日子。”母亲叹了口气,用袖子擦了擦流下的泪,“他心里那个结,一辈子都没解开,觉得亏欠,觉得没把一碗水端平。”我们几个都哭了。

父亲去世后,大哥成了我们的主心骨。每次家里举行什么活动,大哥都是主动担当起父亲应担的责任。我们兄妹四人心里更加尊敬大哥。可叹大哥不假年,才过五十岁就出了意外,辞离了人间!我不知道,在天堂里,大哥是否还会想起当年被绑在木柱上挨揍的情景?想起结婚那晚赌气不去洞房时父母的低声下气?他是否最终理解并体谅了父母的不易,与往事达成了和解?

后来弟弟做新房,要把老屋拆了,整理收拾东西时,母亲说什么都要把那张老方桌留下,说:“放在我的房间里,给你爸守着家。”我再次把目光投向那张和我们共同经历了风风雨雨的方桌,四条腿瘦瘦的,有一条明显短了些;桌沿已经腐朽,露出几块蜂窝状的纤维;桌面枯黄,斑斑驳驳,早已不见当年父亲用烟杆敲出的印痕。小时候的情景不由地浮现在眼前:在群山拥簇的一个山村,一间木瓦平房,窗口垂着一个簸箕,檐下挂着尺把长的冰凌,屋内叽叽喳喳,一家人挤在一张桌子边上吃饭,父亲抿着酒,母亲捧碗稀粥,大哥弯下身子给桌子垫石片。阳光从屋顶明瓦上照射进来,落在桌面上,晃得人眼睛发花……我分明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。

一张垫不平的方桌,其实就是我们这一家子的命,是一代穷人家父母的命。锅碗瓢盆、酸甜苦辣、风雪晴阴,他们拼尽全力权衡取舍,但到底还是有牺牲、有亏欠。家里为摆稳一张桌子,大哥是一方垫石,父亲母亲也是一方垫石。现在日子好了,我们的桌子,放在宽敞的、大理石铺地的客厅里,四平八稳,再也不用垫石片,可我还是常常想起老家那张垫不平的方桌,想起桌子上面、下面的各种苦涩。

矮胖得像油桶的丁二,穿着大花裤头,敞着

上衣,露出胸膛,衣拉着鞋子在广场上溜达。

丁二看到花坛旁摆一溜人物画像,有个瘦高戴眼镜的小伙坐在小凳上,对着画板看着前面方凳上端坐的老人,挥动画笔。

丁二撇着嘴问小伙:“干嘛呢?”小伙笑眯眯地答:“大叔,画像呢。”

丁二眨着小眼凑上前瞧,小伙拿画笔“唰唰”勾画。丁二抬头看老人:“画得真像,怎么画?”小伙说:“小幅100,中幅150,大幅200。”

丁二还从没画过像,他挠着稀疏的秃顶说:“给我画张大

幅。”丁二坐到方凳上,小伙对着丁二开始画。半小时后,小伙站起身说:“大叔,好了,我还要对画像再处理再完善,你明天来

画像

◆ 蔡永平

取。”丁二吹着口哨穿过广场,他突然觉得画像有点贵了,皱着眉头思忖:画像是我的,只有我会要。丁

二嘿嘿笑了。第二天,丁二来到广场。小伙展开画像,丁二盯着看,画像像活了样。

丁二沉下脸:“这画的是谁呀?怎么不像我呢,我给50。”小伙愣愣:“大叔,说好的200呀!”丁二翻白眼:“画得不像,就50,多一分不给。”

两人争吵起来,人们围上来。有人拉过小伙,低声劝他,丁二要耍横惯了,你惹不起他。小伙指着画像问丁二:“大叔,你说你不像我,这画像不是你了吗?”丁二鼻孔朝天,“嗯”应一声。

小伙拿过画像,在画像下写了四个字“泼皮无赖”,将画像摆在了花坛旁。

门把手上的红袋子

◆ 江咏萍

推开电梯门,一眼就瞥见自家大门的把手上,挂着一个红塑料袋。那鲜艳的红,恰似一团热烈燃烧的火焰,在开春的清冷空气里,跳跃出一抹别样的温暖。我心里暗暗疑惑,袋子里装的是什么?轻轻解下红袋,人便是一捧碧绿鲜嫩的菜羹,一看便是刚从山下田间采来的。我瞬间明白,这一定又是隔壁404室送来的时蔬。

我们这栋楼一梯三户,我家在中间。东边404室是鲍家夫妇,老家在郊外的高岭,以水产养殖为生,每日早出晚归,十分辛苦,孩子在外地上大学。西边406户姓谢,男主人是部队服役,家中只有年轻的母亲和两个孩子。每年寒暑假,她们便去部队探亲,房子常常空着。年的余温未散尽,探亲的母女三人必定未归。除了404室的鲍家夫妇,还能有谁会悄悄挂上这袋温暖?

当年随先生因工作调动来城里买房,常听人说,城里人来自天南地北,不好相处,更有人吓唬我,说城里多的是“天门天”房子好了,我们的桌子,放在宽敞的、大理石铺地的客厅里,四平八稳,再也不用垫石片,可我还是常常想起老家那张垫不平的方桌,想起桌子上面、下面的各种苦涩。

个陌生的本地号码突然打来,像一阵急促的鼓点,打断了我们的美梦。电话那头说,城里的新家夜里遭了盗贼,我们匆匆赶回才知道,404室也未能幸免。可恶的小偷暗窥疑感,袋子里装的是什么?轻轻解下红袋,人便是一捧碧绿鲜嫩的菜羹,一看便是刚从山下田间采来的。我瞬间明白,这一定又是隔壁404室送来的时蔬。

我们这栋楼一梯三户,我家在中间。东边404室是鲍家夫妇,老家在郊外的高岭,以水产养殖为生,每日早出晚归,十分辛苦,孩子在外地上大学。西边406户姓谢,男主人是部队服役,家中只有年轻的母亲和两个孩子。每年寒暑假,她们便去部队探亲,房子常常空着。年的余温未散尽,探亲的母女三人必定未归。除了404室的鲍家夫妇,还能有谁会悄悄挂上这袋温暖?当年随先生因工作调动来城里买房,常听人说,城里人来自天南地北,不好相处,更有人吓唬我,说城里多的是“天门天”房子好了,我们的桌子,放在宽敞的、大理石铺地的客厅里,四平八稳,再也不用垫石片,可我还是常常想起老家那张垫不平的方桌,想起桌子上面、下面的各种苦涩。

那年春节,我们早回了乡下。清晰记得正月初六清晨,一